

保障合法的研究开发活动,进而提升我国运用生物技术应对生物风险的能力。这些科学技术和知识应具有最高质量、多学科交叉且为同行评议,并尽可能紧跟国际前沿发展水平。以科学为基础,生物安全体系的建立需要做到发展与安全兼顾,风险与利益平衡。既要认识到生物技术潜在的风险问题,又应看到生物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益处,既要实施生物安全治理,也应追求科技的进步。综合平衡生物技术的潜在利益和风险应是指导生物安全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基于发展与安全兼顾,风险与利益平衡,我国应加强生物安全高等级实验室,即生物安全防护三级(BSL-3)、四级(BSL-4)实验室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制度完善。当然我们需要注意到,生物安全高等级实验室并非越多越好,因为此类实验室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生物安全风险的存在。危险病原体的广泛研究,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研究人员和周围社区面临安全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对生物实验室加强整体性的战略规划布局,在加大对其投入力度的同时也应加强监督管理,以控制生物安全实验室本身带来的生物泄漏的安全风险。

在生物安全体系的构建中,生物安全决策的

公众参与以及决策透明至关重要。生物安全决策应当尽可能地吸纳利益攸关方参与,应保证公众有适当的机会获取信息,并有机会负责任地参与到生物安全决策中来,从而建立更广泛的共识。

最后,构建生物安全防范与治理体系时,国际磋商与协作必不可少。从2014年至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以及当前全球正在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来看,生物安全的危害不受国界的限制。安全危害始于一国,很快就会将影响传入他国。正如英国2018年《生物安全战略》报告所指出的,这种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因为区域稳定的丧失会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形成移民压力,并造成恐怖主义和猖獗犯罪的无管理空间。鉴于生物安全威胁的跨国性,生物安全治理的国际合作十分重要。因此,我们应鼓励在符合我国国家安全要求的前提下,特别是在生物安全相关底层技术、生物安全防控能力建设和财政资源等方面积极参与双边、多边以及区域性合作,以通过国际努力构建起我国生物安全的国际屏障。

作者简介:周琪(1970-),男,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干细胞与发育生物学。E-mail:zhouqi@ioz.ac.cn

彭耀进(1986-),男,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命科技法与伦理、知识产权与标准、科技与创新政策等。

DOI: 10.3724/SP.J.1224.2020.00009

● 笔 谈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哈姆雷特之问

刘孝廷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由于有了2003年SARS的先例,所以这次新冠肺炎事件一开始就激起了学界和社会的积极回应与热议,虽然由于官媒集体失声,这种议论的影响力远不及2003年,但这是社会因素导致的,而无关学者们的良知。也由于这个缘故,就新冠

肺炎事件本身而言,透露消息的、提出批评的、帮忙支招的、呼吁反思的等等多是在自媒体上传播,导致各种主张琳琅满目、五花八门,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学界对社会事务的责任感和热忱。当然,比之于科学家特别是医学界,人文社科界

尤其是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都是柔性的,而且多属事后诸葛,虽然也并非可有可无。此次疫情可谓是对中国几十年发展的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检验,这也就意味着,说检验哪方面都可以。此处仅从一种比较边缘的视角,用一个略微轻飘的题目谈几点粗浅认识。因为据说,灾疫期间就连小区门口的保安都成了“哲学家”,问的都是直击灵魂深处的哈姆雷特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然后还深情地给你“一枪”(看你是不是头脑发热了)。其实,调侃过后,这也确实是个很值得深思的甚至略带苦涩的严肃问题。

一、大疫突来各有失——我们究竟是谁?

总体上看,这次新冠肺炎引发的灾疫,不折不扣的是一场人祸。无情的灾疫接二连三地在这个国家出现,也实在令人不寒而栗、百思不得其解。不过,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次灾疫大体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事实与技术层面,需要查清病源、揭示病毒的本质和机理,然后找到抑制和消除病毒的办法,这基本属于科学技术问题,尽管需要社会诸方面配合与支持。目前人们关于究竟蝙蝠是元凶(与SARS一样),而穿山甲可能是中间宿主等还存有争议。另一方面是病毒的传播与防治涉及一系列相关部门和各色社会人群的联合动作,触及的不单是不同的人,更有体制、吏治、权力的现实运行和国际关系等,从整体上检验了一个国家的应急和社会动员与协同能力,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问题。为了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和防控协调,日前湖北和武汉的主要领导已经大换血。同时,随着疫情的扩散,人们也看到了欧美的多种应对方式,以及防疫和生产的相关调控。再一方面,是在这些外显背后不容易看见的素养、心态、道德品质等精神文化问题。看得见的往往是物质硬件或社会景观,看不见的则是社会和个人的内在禀赋、精神特质等,有时又是这些决定了一个社会为什么是这样

运行的。现在看到的是网络舆情控制也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严苛程度。

就我等边缘而卑弱的视角感受而言,最突出的是,这场灾疫确是一个中国人性展现的大舞台。从普通群众到高级官员,人在危机面前的表现都得到了充分显现。固然,我们首先看到了医务人员等为了救死扶伤,不顾个人安危、不怕疲劳持续勇敢地战斗在抗疫第一线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感人场景。但是,在这个举国体制的视野内,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天南海北的各行各业的普罗大众面对灾疫的具体表现,有业务部门,有主管部门,更有无数被隔离在家的普通人和南北各地的旅人。《方方日记》成为热点事件即是集中体现,其总体上可谓是国民心态坦露的博览会,是社会治理和破坏式增长之文明的一次总危机。

这里,我们只挑各阶层中最弱的一级说几句闲话。从报道看,突出地表现为,许多人既不尊重珍惜野生动物的生命,喜欢尝鲜猎奇讲排场,什么都吃,并以此炫耀,吃得病毒伤天下,吃得禽兽自由而人入“牢笼”。另一些人或是出于对病毒的无知,或是出于对生命本身的不爱惜,在大疫已来之时,仍不采取严格防护措施,甚至照常聚吃聚赌,吃万人宴搞集体婚礼,结果导致毒疫被大面积广泛传播,最后酿成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比如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黑龙江,死亡率一度排全国第二!更有一些人,已经知道自己接触了新冠病毒传染源,仍不自我约束和上报信息,反而依旧不负责任或怀着侥幸心理故意去接触家人和社会人群,导致病毒被大面积地二次传染,最终成为“毒王”,其行迹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构成犯罪了。至于官员不熟业务、推诿撒谎、咆哮公堂、相互“甩锅”;各地野蛮执法等现象更是举不胜举,可以说就各级部门以及不同国民的总体表现而言,突出的人类底色是:“我不知道我是谁”,甚至很难说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了。实在应该怀疑我们在时空上是来错了地方。

二、危机背后的文明——我们究竟从哪里来？

大疫当前，科学界和管理界可能一直在讨论，武汉究竟是因为什么和怎么样引爆的病疫？然后想办法去解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文科学在思考问题时有自己的方式，很可能通过归纳和类比把视野放得很大。尤其是2019~2020年度之交，地球上可谓灾情不断，美国大流感、亚马逊和澳洲大火、新冠肺炎疫情、非洲西亚蝗虫之灾蔓延等前后相继，各个触目惊心，无不影响世界局势。如今，整个地球表面已焦头烂额百孔千疮，引发的各种危机不是可多可少或可有可无，而是根本性整体性的。所以，我们也必须把这次新冠灾疫尤其是其次生性的扩展看成是地球整体灾害的一部分，看作是文明演进的一个后果。

这里，我想从灾疫与生态文明视角集中表述几个一般性的立场。

首先，迄今的文明都是反生态的，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就是反生态，历史上治理灾害的方式从来都是人退灾退（如沙漠），因而在文明进程中出现各种灾情都是必然的，只不过什么时候通过何种方式在什么地方以何种程度出现，可能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而已。文明对生态的破坏取决于人的活动范围特别是工具触及的程度。从范围上看，农业文明毁了人类生存的地表生态，工业文明则向深广度进发，毁了地下和天空的生态；农业文明主要在生物层上破坏生态，工业文明则在化学层、基因层、基本粒子层彻底地摧毁生态。所以，相比农业文明的破坏性，工业文明具有摧毁性，根本不可能谈持续的问题。如果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延续工业文明模式，那就更可怕。与生态问题相对应，灾害也都是越来越“高级”，比如从风霜雨雪旱涝瘟疫到病菌病毒等，都是随着发展一次次地进行质的跨越。今天人类应该努力探究并自觉地改变和抵制这种发展模式。

其次，几乎所有的文明皆因生态优越而兴，亦皆因生态破坏而毁（战争因素所致除外），也就是说生态问题根本上是文明问题。所以，毁灭生

态就等于把与之相匹配的一种文明做死，其罪孽程度远比贫富不均、人身奴役等深重，因为文明的根本是延续，人的根本是要活着。文明不在了，什么就都无从谈起。今天的新冠灾疫让人们再次体会到生命之脆弱以及活着之实在而对于文明的根本意味。

再次，生态问题是典型的全球问题，这虽是旧知，却很少被重视。而生态问题的存在之根本就是以竞争为基础的整个地球文明有致命缺陷。由于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以借助，所以科学技术只能单向度地不断把问题引向“深入”，导致问题愈演愈烈积重难返。或许，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向传统要智慧，但简单地回去既不可能，最终也没有出路。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告别现有的外向文明模式或类型而转向内求，而这又取决于人类能不能糅合传统而在现有文明中生出一个新文明来。就此，生态问题的出路也还需要回到文明本性自身。

由于前述，新文明的出场需要彻底改变现有文明的路向和本质。因为世界上有两个循环：一个是自然的循环，以天文地质年代纪年；一个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循环，以生产生活的工序“纪年”。二者的时间差别由几倍到几百万倍不等。本来，第一个循环作为基础包容着第二个循环。但现在的情况是，第二个循环的超速进程已经突破和打断了第一个循环，使得自然首尾不得相顾，现有文明的作为和本性（现代性）都体现在这里。所以，今天的文明不是如何再从自然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而是如何让自然自己能够循环和活下去。要做这件事情有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让破坏性的生产和消费等彻底停下来；一个是对于破坏严重而还可以挽救的地方适当做一些回赠性的修复工作，使其能够顺当地回归本然。而这对今天已经发疯了的世界而言又如何是可能的！

对此，我的主张是先分层，即适当把理论与实践区分开，在理论上明确生态文明的同时，在实践中也不简单抛弃工业文明的某些成果，否则

既不现实, 生态文明也搞不起来。工业文明既是现代生活的基础, 则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弃而回返, 而是应该利用和超越。这或许属于与虎谋皮, 可也无从选择。具体思路是: (1) 先突出文明中的生态要素和地位, 这在目前的理论中已经做到了; (2) 再强调文明或发展的生态原则, 这个也已有了一定刚性规范, 虽然还不充分甚至很不够; (3) 落实生态在文明中的本体地位, 完全基于生态建设一个新文明。或许最后这个目标有点痴人说梦遥遥无期, 这也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现有文明的自我毁灭速度, 二是人类的觉悟程度也就是人类自己的文明化程度。我想, 人类应该体会到自己生存品质的根基在哪里了, 尽快悬崖勒马。只是不知道这种觉悟是否来得及, 是不是已经很晚? 至于不肯觉悟的, 那也就只能“绑架”全人类与其“同归于尽”或被觉悟者硬性“规训”了。

三、哲学的小作为——我们究竟要去哪儿?

现在回到“现实”中来。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 哲学从来都是滞后的, 既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和技术 (特别是医学) 直面病毒本身解决问题, 也不会像管理学或社会学等直面汹涌的人流进行疏导和安置, 它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疏解和劝慰工作, 而且多是事后性的。但是,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任何参量都有其定轨而不能由其他因素取代, 哲学也一样。哲学作为精神文化因素属于社会系统的慢参量, 它对社会的影响永远不会像科学技术工程那样有明显的直接的具象体现, 但却以无形的方式, 无时无刻不起作用。通过前述的分析, 我们已经知道, 这次灾疫本身也是我们的发展哲学出了问题。以后的出路, 也还是要从根本上纠正我们的发展战略, 比如按照海德格尔所说的“第二开端”去重新设计人类文明的路线, 让灾疫产生恒久的文化价值, 从而完成文明的自我救赎, 正所谓“多难兴邦”是也。当然, 这中间还有许许多多的环节, 这也是哲学在治术和大战略上的实践特性。

我想在此补充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边缘话题, 那就是哲学中的一个小传统——治疗传统, 在古希腊也叫斯多亚传统。我们知道, 如果回溯到哲学的源头, 其基本含义就是毕达哥拉斯所说的“爱智慧”。但是, 怎样才是爱智慧, 历来有争议。而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是起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我们平素所说的认识论、方法论、伦理学、美学等, 都可归结在这个传统下。但是, 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等的爱智慧, 并不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而是要比后者涵蕴宽泛得多。由于形而上学已是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 (海德格尔说是西方思想的命运), 则这个智慧“差”或余数, 相对的就可视作西方哲学的“小”传统。实际上这“大小”两种传统在西方哲学中是并行的。其中小传统中最强的一股潮流就是内修或治疗的哲学传统。这种哲学治疗不同于心理治疗: 首先, 它不把对象当患者 (不以其病为病); 其次, 它的主要内容是伦理而不是心理问题; 其三, 它主要是通过谈话或对话来进行沟通, 以消除误解和曲解, 因而是苏格拉底论辩术的延展, 所以也简称“话疗”。最后, 哲学治疗很少单独存在, 通常会伴随其他治疗一同展开。但是哲学治疗的寓意和价值却是独立的。

哲学治疗之所以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是因为我们这次重大灾疫过后会留下一系列后遗症, 17 年前的非典就是一面镜子。因为灾疫早晚会过去, 但是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却很难在短期内平复和解决。首先是经济上的, 可能会损失极其惨重, 企业倒闭、工人失业、GDP 暴退, 直接伤及民生, 是最现实的问题。其次是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评估, 新冠灾疫集中暴露了其中的问题和缺陷, 灾疫过后一些重大事项怎样调整和改革都是大问题。再次是公信力问题, 这次灾疫的一大病因就是“一真难求”, 到哪里都没有准话, 那么如何重建公信力或实现信誉重塑? 最后是国际交往的恢复, 大多数国际航班中断, 如何快速恢

复？许多客户和航线可能因此改变，下一步怎么办？诸如此类，预计有十几个大方面有待后续全面应对。处理不当或稍有差池，就可能谬之千里，导致医疗危机很容易转化为社会和文化危机，引发连续的社会震荡。现在人们都忙着抗疫救灾，无暇他顾，甚至许多智库和媒体也都失声，至今还没有看到多少有远期规划和建议的可用材料。可是，这样的寂静能坚持多久？

这些所谓的后遗症中，有一个就是人们的心理和价值观等受到冲击后，都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或混乱。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及时享乐主义等可能会极度盛行。如何让人们的情感和认识得以平复，以回归正位，也是一项非常艰难复杂的社会精神工程。套用王阳明的句式则是“破身体病毒易，破心中冠毒难”，所以灾疫过后的精神抚慰和自救是必须的，应该多路并进共同应对。

其实，哲学治疗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只要有哲学工作者的地方都可以随时随地因人而异

地进行，就像苏格拉底在市场和人们谈话一样。特别是由于病疫期间的严格隔离，疫后人们都渴望见面和沟通，释放心中淤积，这为哲学治疗提供了大好时机。应该创造一定的条件，让人们适度集中在一起去说去侃去倾吐，以释放身体积存的巨额负面情绪和能量，使之在倒空之后能安心生活，尽可能少去破坏社会。或许这方面的咨询师一时供不应求，这可以通过适当的速成培训把以往哲学教师的“死”知识激活，以应急需，也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简易推广。没准，后一种形式借助新媒体还可能有更好的效果。总之，殷鉴不远，我们最初没有抑止住新冠肺炎的疯狂蔓延，现在更不希望“非典后遗症”在下一步重演和扩散，形成次生灾害。而是渴望国人渡尽劫波和大难后能够觉醒，在迈向新文明的征途中获得新生。

作者简介：刘孝廷（196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史。E-mail: liuxiaoting@bnu.edu.cn

DOI: 10.3724/SP.J.1224.2020.00013

● 笔 谈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研究之伦理反思

张新庆

（北京协和医学院 人文学院，北京 100730）

为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各级政府、医护人员、社会各界均投入到这场规模空前的新冠肺炎阻击战之中。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医护人员用生命护佑生命，科研人员从病毒学、流行病学、临床医学等方面快速研究新冠病毒的分子构成、致病机理、感染机制、疫苗和新药研制。同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应从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专业视角普及知识，阐述新论点，辨析认识误区，剖析心理恐慌或社会歧视的社会文化根

源。从社会性问题角度来反观本次疫情，隐私泄露是一个伦理问题，社会歧视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公权力的使用是一个政治学问题，社会恐慌偏重于社会心理问题。下文将从伦理学视角考察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研究中存在的伦理难题。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战疫中，针对新冠病毒的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试验性用药显得尤为重要，直接关乎千千万万患者的生命安危。为此，笔者将就此类非常时期的医学研究加以伦理反思。